

程中原 著

毛泽东 张闻天

与 长 征 胜 利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毛泽东 张闻天

与 长 征 胜 利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 / 程中原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62-1172-4

I. ①毛… II. ①程… III. ①毛泽东(1893~1976) —生平事迹 ②张闻天(1900~1976) —生平事迹 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IV. ①A752 ②K827=7 ③K264.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7696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胡孝文 陈棣芳

书名 / 毛泽东张闻天与长征胜利

作者 / 程中原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 / (010) 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 63056975 63292520

<http://www.npcpub.com>

E-mail: flxs2011@163.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开 710毫米×1000毫米

印张 / 19.25 字数 / 219千字

版本 /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刷 /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1172-4

定价 / 42.80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引 言 / 001

一 同上长征路 / 006

中央队三人团 / 006

“博洛矛盾”的加深 / 008

“毛洛合作”的发展 / 016

张闻天发表“战略社论” / 021

二 长征路上的争论 / 026

毛、洛、王在征途上的交谈 / 026

过了老山界以后的激烈争论 / 027

通道“转兵” / 029

黎平决策 / 030

黄平橘林谈话 / 031

三 遵义会议 / 034

袭占遵义 / 034

遵义会议的准备和召开 / 035

博古的报告 / 037

洛甫的反报告 / 038

毛泽东的发言和会议的进展 / 039

遵义会议的胜利 / 042

四 从遵义到扎西 / 045

洛甫就任总书记 / 045

决定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 049

作出“回兵黔北”决策 / 050

通过《遵义会议决议》 / 051

决定“缩编”和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 / 056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 058

离开扎西后的继续传达贯彻 / 060

五 毛泽东军事领导的确立 / 065

毛泽东重返军事领导岗位 / 065

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 066

张闻天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 / 067

关于“打鼓新场战斗”的争论 / 068

张闻天赞成成立新的“三人团” / 070

六 会理会议前后 / 071

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 / 071

走路与打仗的分歧 / 074

会理会议 / 076

会理会议的影响 / 077

七 一、四方面军会师 / 081

强渡大渡河前后 / 081

懋功会师 / 084

两河口会议 / 087

八 同张国焘的团结和斗争 / 092

张国焘的野心膨胀和毛、洛、周的忍让争取 / 092

沙窝会议前后 / 095

毛儿盖会议前后 / 102

对张国焘的等待和争取 / 104

危急关头 / 106

脱离险境 / 108

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 109

九 找到落脚点 / 112

到达哈达铺 / 112

张闻天写读报笔记 / 114

毛泽东赋长征诗 / 116

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苏区挺进 / 117

十 初到陕北 / 120

进驻吴起镇 / 120

下寺湾决策 / 123

兵分两路 / 125

提出新策略 / 127

十一 瓦窑堡会议前后 / 132

“国际代表”到达瓦窑堡 / 132

毛洛的配合 / 134

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内容 / 135

改变对富农的政策 / 138

瓦窑堡会议 / 139

瓦窑堡会议的传达、贯彻 / 143

十二 打开新局面 / 145

东征 / 145

回师与西征 / 152

开展白区工作 / 154

联合东北军及西北军 / 161

对蒋策略的改变：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 171

十三 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 180

中央对张国焘的团结争取和朱德等同张国焘的斗争 / 180

张国焘另立“中央” / 182

与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斗争 / 185

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 / 190

十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 197

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甘孜会师 / 197

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一方面军的策应 / 202

制止张国焘的再度动摇 / 208

三大主力大会师 / 214

结束语 / 224

附录一 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 / 238

附录二 杨尚昆谈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 243

附录三 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 247

附录四 长征的胜利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 / 276

主要参考书目 / 288

后记 / 290

新版后记 / 293

引言

1935年10月15日，苏联首都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号共产国际^[1]总部的会议室里，不久前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正在开会。会议由共产国际总书记、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主持。会议桌旁围坐着书记处的书记和候补书记们。他们大多是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有：著名的理论家、联共的曼努伊尔斯基，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德国的威廉·皮克和弗洛林，捷克的哥特瓦尔德。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王明和康生也出席会议，他俩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新当选的候补书记。

会议室里安静极了，书记们正倾听一位名叫史平的中国同志作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2]那时，还没有“长征”这个名词，因为是向西撤退，称为西征。

史平这样开始他的报告：“同志们！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3]史平从为何决定西征讲起，分三个阶段

[1]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决议宣布解散。

[2] 这个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报告》。中文版发表于《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题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叙述了西征的过程，讲到红军征途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取得的重大胜利和主要的失误，讲到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1]史平进而叙述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军事指挥下，红军灵活机动地作战，接连取得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胜利，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实现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报告的这个史平，不是别人，正是陈云。

陈云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长征中，他还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党代表、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5月31日泸定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他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

6月7日、8日，红军攻占天全、芦山。陈云随军到达天全县北雪山脚下的灵关殿，由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悄悄离开红军队伍。安排陈云离队的同志故意让被红军扣押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局长溜掉，让他同躲避红军外逃的陈云、席懋昭相遇，结伴同行。陈云这样一路顺利通过所经关卡，经天全到荥阳县城那个教育局局长的家里住了一夜。后经雅川（今雅安）抵成都。陈云带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刘在成都美丰银行任职的朋友，托他给上海章乃器（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汇去请章转交上海地下党的一笔活动经费，并托人在《新新新闻》报上登载一则“遗失私章”的《廖家骏启事》，向中央发出平安到达成都的暗号。陈云离开成都后直奔重庆，持刘伯承信找到在重庆开中药铺的刘的弟弟刘叔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禹。在他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直航上海。^[1]

陈云到达上海后，同先到达此地的潘汉年会合。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和陈云先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潘汉年参加了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陈云于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个正式代表之一。当时在上海的陈潭秋、曾山、杨之华等苏区干部随陈云同行，一起到达莫斯科。

陈云是最早向国外传播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军事史上艰苦卓绝伟大壮举的第一人，也是系统总结长征经验的第一人。他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报告中，不仅叙述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而且还总结了红军长征的经验。陈云指出：“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遵义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了过去的领导人”^[2]。

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中总结的长征胜利的首要原因是完全正确的。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史上，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不可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而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功绩，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确立。遵义会议撤换了错误领导，推选洛甫（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习称党的总书记），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洛合作”，团结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领导全党全军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1]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陈云传》作者所据材料为：陈云《我的自传》手稿，写于1940年7月10日；陈云的一次谈话记录，1940年7月22日。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7、9页。

毛泽东在谈到长征胜利及其经验时，特别着重指出遵义会议确立正确领导的关键作用。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毛泽东没有忘记张闻天的功劳，多次评说“毛洛合作”和遵义会议、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关系。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一次大会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1]

1950年1月18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与正在赴莫斯科途中的周恩来通电话，商定派张闻天为出席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随后，毛泽东即电告在北京的刘少奇，指示“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2]。第二天新华社发表的《张闻天简历》特别讲他“1931年以后，参加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在1934年冬至1935年冬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张闻天是这一长征的领导组织中的一员”^[3]。

1969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上提议要选举张闻天当九届中央委员。他说：张闻天、王稼祥，遵义会议是靠在我们一边的，同我们合作的。那时候我们很困难。以后也是好事做得多嘛！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一边，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这一次张闻天、王稼祥是否选上，值得考虑。^[4]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关于选举问题的两次讲话（节录）》（1945年5月24日、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3] 新华社1950年1月19日电。引自《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第841页。

[4]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837页；徐则浩主编：《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

毛泽东为什么难以忘记张闻天？通过回顾长征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毛洛合作”同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成功关系太大了！“毛洛合作”同长征的胜利关系实在太大了！本书试图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分析，来回答“毛洛合作”与长征胜利的关系这一问题。希望对读者了解长征的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有所裨益。

让我们从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踏上长征路说起吧。

同上长征路

中央队三人团

开始长征时，不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那么长的路，没有“长征”这个名词。那时红军是向西边走，实行战略大转移，最初的目标是到湘西同先行突围转移的红二、六军团^[1]会合。当时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西征”。

长征出发时，按照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要分散到各野战军团中去。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后提出异议，这才被留在总部。毛泽东与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一同行军，一起宿营。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洛、王三人一道，从中央军委所在地瑞金的梅坑出发，到赣南省省会于都

[1] 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和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从江西碧溪、新江地区突围转移。10月14日在黔东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湘鄂川黔边根据地。

集结，渡过于都河，踏上西征路。就这样，毛、洛、王三人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三人团”。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止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肚子里还有弹片。他们两人都坐担架。担架是毛、王自己设计的。竹子抬杆特长，便于爬山，抬起来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盖，好像南方船上的篷，不怕雨淋日晒。洛甫（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他们随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行动。这个纵队由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供给部、卫生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等组成。

长征出发时，毛、洛走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有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是博洛矛盾的加深，一是毛洛合作的发展。



▲ 图 长征出发前的红军队伍



▲ 图 瑞金武阳桥——中央红军走过此桥踏上长征路

1932年冬，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后，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实际工作中，以“博洛矛盾”（即中央两位主要领导人博古和洛甫）的加深为标志，中央“左”倾领导集体已经出现裂痕，开始分化；而以“毛洛合作”的发展为标志，受“左”倾领导集团打击、排挤的毛泽东的路线，已经被实践证明为正确路线，毛泽东和洛甫已经在同“左”倾错误的矛盾、斗争中取得一致，建立了战友的情谊。

“博洛矛盾”的加深

张闻天（洛甫）同秦邦宪（博古）相识很早。1925年暑期后，张闻天到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并开展苏州地下党工作的时候，秦邦宪



▲ 图 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是“苏高工”（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中的先进人物。张闻天到“苏高工”作过讲演。同年10月下旬，张闻天离开苏州到苏联留学；第二年年底，秦邦宪也到了莫斯科。他们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Измайлов（伊斯美洛夫，张闻天的别名“洛甫”即取其俄文化名的后一个音节）以学识渊博著称，Погорелов（博古雷洛夫，秦邦宪的别名“博古”即取其俄文化名的前两个音节）以能言善辩出名。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博、洛都站在支部局的一边。1930年博古回国，在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同王明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博古担任团中央书记，显示了组织与鼓动才能，受到少共国际表扬。

1931年秋，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被选中接替他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在此期间，张闻天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博古共事，虽然工作作风不一样，对若干具体